

惠泽乡里：乡村创业活动提升基层 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作用机制

刘志阳 李天旭

摘要：调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途径。本文从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中心治理的视角，探讨了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基于多源地理POI数据和企业工商注册数据，本文构建了2012—2021年24454个乡镇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乡村创业活动显著促进了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机制分析表明，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政府层面的倒逼机制、市场层面的替代机制和社会层面的信任机制三个渠道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在乡村创业经济规模较大、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地区更为显著。乡村创业活动推动了基层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政府、市场和社会应高效协同推进乡村创业活动的开展，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关键词：乡村创业 基层公共产品 多中心治理 镇级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323.6; F724.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公共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Samuelson, 1954; 1955），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基层社会主体比政府掌握的信息更为直接和充分（Tresch and Zlate, 2007）。因此，多中心治理模式可以发挥各主体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优势，推动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问题研究”（编号：22AZD14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乡村创业影响基层公共产品影响机制研究”（编号：CXJJ-2024-420）。

[作者信息] 刘志阳、李天旭（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litianxu1996@163.com。

从政策实践来看,《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等相继印发,成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基础性、指导性文件。《“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成为影响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①。但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和信息不完全的特征,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配置体系难以触及全部地区,容易出现部分政策失灵问题。

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剖析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公共产品供给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多中心治理涉及多元主体间的资源获取与利用,强调多个独立主体通过一定规则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旨在通过协调过程解决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问题(罗家德和李智超,2012)。在这一框架下,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致力于建立良好的管理秩序和协同渠道,通过协作的方式共同参与公共事物治理(Ostrom,1998)。多中心治理模式将信息、资源与能力共同集结起来,促成了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的成果与目标(Emerson et al.,2012)。随着参与的社会主体不断增多,多中心治理模式在实现福利均衡与保障社会公平方面的有效性也将进一步增强(Jones et al.,1997)。

不可忽视的是,在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创业活动会围绕社会效益进行价值创造,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可能远超个人经济收益,在经济体系之外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Santos,2012;刘志阳等,2018)。乡村创业活动则是弥补基层市场价值链缺失、构建包容性市场体制的关键途径(邢小强等,2011),能够通过减轻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改善基层的社会福利状况。本地参与感、责任感所催化的乡土情结和情感依恋是乡村创业的重要动机(Alsos et al.,2014)。乡村创业活动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相比于一般的创业活动,乡村创业活动可能具有更重要的社会功能。在此情境下,乡村创业活动与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如何,仍待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鉴于此,本文拟使用中国乡镇尺度的面板数据检验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往研究多从经济视角探讨创业活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对特定情境下创业活动(如乡村创业)的细致考察。本文从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考察乡村创业活动的社会功能,可以丰富探讨创业活动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第二,以往相关研究侧重分析政府在公共产品配置中的主要责任,对于其他主体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学术界通常认为非政府主体是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本文拟从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个视角解释乡村创业活动影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揭示其内在作用机理,为完善基层公共设施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实践启示。第三,本文拟采用细颗粒度的地理空间数据,创建一个乡镇面板数据集。基于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获取过程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拓展性,能够提供较为精细的数据来源,对于深化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参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0/5667482/files/301fe13cf8d54434804a83c6156ac789.pdf>。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基础

公共产品的定义和来源一直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学术界对于公共产品的划分，通常从其属性和供给方式两个维度展开。Samuelson（1954）首次明确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他认为这类产品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必须依赖政府供给。后续相关研究则提出了混合公共产品的概念，Buchanan（1965）指出，俱乐部型公共产品可以通过会员制供给，这一模式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也平衡了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关注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Musgrave（1959）认为，市场机制可为部分准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服务，但市场也会存在失灵情况，导致公共产品的分配公平问题，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和补充。Ostrom（1998）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挑战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模式。她强调，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社区的集体行动也能通过自治机制有效管理公共资源，并提出了“共治”的理念。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公共产品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拓展。贺雪峰（2009）指出，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应以村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注重小规模、低成本、精准化的服务。城乡发展的差序格局也要求农村公共产品治理采取整体性思维，综合考虑供给主体、决策、监督和内容等多个方面，提供无缝隙的公共服务（曲延春，2015）。针对基层治理而言，多中心治理在中国语境下实现了“公共性”“社会性”相结合，也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从多中心治理的有效性来看，当存在其他解决途径时，多中心协作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当正式的治理机制缺失时，利益相关者可能形成多中心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强调过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吸引非政府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共事物治理。多中心治理通过建立多方协作体系，合作解决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Brass（2012）的研究表明，联合非政府组织能够显著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的质量。Koch（2005）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指出多中心治理需要考虑被排除在传统治理模式之外的小型经济组织。此外，Tsai（2007）关于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研究发现，基层的“团结性群体”能够给予当地政府更多的道德奖励，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动机。总体来看，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在合作过程中会围绕各自价值目标展开磋商与合作，其间可能存在资本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制度逻辑冲突（孙谋轩和朱方伟，2023），但是，通过任务分配、风险分担和合约设计等制度安排，可以减少策略性行为，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化（龚强等，2019）。

（二）研究假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创新创业环境不断改善，涌现了一批乡村创新创业带头人，他们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乡村创新创业带头人饱含乡土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的乡村企业家。乡村创业活动是指在农村地区或乡村社区内，个人或团队利用当地机会、资源和市场开展创新性的经济活动，以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当地

收入、改善乡村生活质量、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企业创建过程^①。尽管有些乡村创业活动的直接目标并非提升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但是在客观上为社会福利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本文认为，不同于单纯谋求经济利益的城市创业活动，乡村创业活动是一种与乡村情境密切交互的经济过程，是建立在经济理性之上的一种集体理性（Alsos et al., 2014）。

从现实情况来看，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可能难以保障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在这种情形下，就有必要引入非政府主体来部分承担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基层公共设施通常是由小规模运营商提供的，这些创业活动填补了基层服务的空白领域。同时，农村地区也会借助当地的经济组织建立一种互惠的社会秩序，满足个体的某些需求，提高集体福利水平（Weiss et al., 2024）。具体而言，在基层公共产品匮乏的地区，政府并不是当地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创业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部分功能，提升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例如：在政府供给能力不足的公共交通领域，政府可以通过与一些小型运输企业合作，以改善当地公共交通的效率和质量（Torres-Montoya, 2008）；在政府公共服务难以触及的农村地区，创业者则会利用当地的自组织过程塑造工作关系，克服公共服务不足的障碍（Barkema et al., 2024）。在中国乡村情境中，乡村创业活动作为一种内嵌于当地社会结构关系的经济组织，具有团结合作、自我发展的社会动力（乔翠霞和王骥，2020），为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经济基础，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重要主体。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的基层公共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各类民间经济组织与公共组织承担的。传统的基层社会形成了一个自组织体系，民间社会长期自发提供桥梁、义渡、道路、水利等多种基层公共产品（龙登高等，2018），以宗族网络为代表的传统治理秩序也在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发挥作用（颜色和刘丛，2024）。社会中的民间力量有可能持续影响当地的公共事物。Tsai（2007）运用中国农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村干部受到村庄内部姓氏网络的监督和约束，有利于提高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王丹利和陆铭（2020）从集体行动和宗族极化的角度研究发现，姓氏集中度越高的地区，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越低，村民也就越有可能通过群体集资的方式，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郭云南和王春飞（2022）的研究发现，村庄内具有祠堂或家谱的前两大姓氏更愿意在公共事物治理上进行合作，从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总之，这些研究关注了历史上的民间组织如何影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为探索非政府主导下的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历史证据。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虽然有些主体已不复存在，但传统社会所遗留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农村地区仍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基层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是不应当被忽视的（罗家德和李智超，2012；龙登高等，2022）。在农村地区开展的乡村创业活动，作为一种内嵌于本地的经济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村民的自组织能力，提升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乡村创业活动能够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增加。

^①具体而言，乡村创业活动包括多种形式，例如：农产品加工创业、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创业、乡村电商和互联网创业、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办农村社会企业、环保型创业等。

公共产品是消费或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受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不同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面临需求表达错位、供给成本过高、资金来源不足的短板。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提升农民生活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和社会供给的互补模式（李燕凌，2016）。乡村创业活动作为一种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动，会对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产生影响，能够通过倒逼机制、替代机制和信任机制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

首先，在财政分权体制框架下，政府承担着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会转化为一定数量的公共产品供给，形成相应的治理绩效（刘树鑫，2021）。对于农村地区而言，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也是影响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具有保障民生的作用，相比于城市地区的公共产品而言，很难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因此，地方政府会出于绩效考核的考虑，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城市地区，造成财政支出偏向经济性公共产品，而忽略民生性公共产品（傅勇和张晏，2007）。而乡村创业活动的繁荣使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投资也能带来经济效益，能够为政府带来经济和民生的双重收益，这会倒逼政府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上。此外，乡村创业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可以改变农村地区的消费理念，激发当地居民对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倒逼政府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农村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进而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一些学者基于文化与消费视角的研究表明，创业通过增加居民消费，对消费市场形成激励作用（Da Fonseca and Campos, 2021; Baktir and Watson, 2021），从而促使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乡村创业活动通过倒逼当地政府增加注意力，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增加。

其次，市场参与是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方式。传统公共理论认为，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公共性与外部性、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但是，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也可以是专属性的、竞争性的和多元化的。在排他性可以满足的情境下，私人企业具备有效生产公共产品的能力，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能够实现效率最优与竞争性均衡（Demsetz, 1970）。在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中，“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往往只能满足居民基础性和通用性的公共产品需求，难以精准满足居民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容易出现供需错位问题。因此，对于一些专用、稀缺的公共产品，可以由市场化的微观主体来提供。《“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也明确指出：“为满足公民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服务需求，一些完全由市场供给、居民付费享有的生活服务，可以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政府主要负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相关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做好生活服务与公共服务衔接配合。”^①乡村创业活动的嵌入性特征有助于基层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实现紧密结合，形成地方性的供需闭环（Shigetomi, 2006）。具体而言，乡村创业活动能够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信息等要素高效整合，引导要素流向当地公共产品需

^①参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0/5667482/files/301fe13cf8d54434804a83c6156ac789.pdf>。

求较高的行业和领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活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乡村创业活动在客观上可以替代部分公共产品的功能。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H3：乡村创业活动通过替代部分公共产品的功能，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增加。

最后，社会供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补充力量。在国家公共产品供给体系难以触达的地区，社会供给是弥补公共产品供给短板的最直接手段。这种供给模式通常由村庄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共同愿景，通过内部协商的形式，自发组织基层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然而，社会供给面临集体行动协调成本太高的问题，进而导致公共产品外部性成本太高（Ostrom, 1998），如何破解集体行动难题成为社会供给模式能否持续推进的关键。实际上，乡村创业活动不仅提供了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基础，还提供了凝聚社会共识的公共空间。无论是生产性还是服务性的乡村创业活动都会促进当地村民聚集，这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村民通过生产合作、信息分享、资源互助等形式强化了社群网络，形成了紧密的社会关系。这种交流互动机会不仅可以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当地村民的信任水平，增强村民的主体意识（Small and Adler, 2019）。这有利于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降低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苏毅清等，2024）。综上所述，乡村创业活动形成的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了自发协商、合作解决公共需求的条件，推动村民通过参与社会供给的方式，如建设小型基础设施等，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据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说。

H4：乡村创业活动通过提升当地社会的信任水平，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增加。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自全量工商注册数据、信息点（point of information，简称 POI）^①数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多源地理数据，利用 Python 和 ArcGIS 地理信息处理工具将精确的地理位置数据投射匹配到中国镇级矢量地图上，在剔除街道、城关镇、中心镇等县级行政区划后，构建 2012—2021 年 220446 条镇级层面的数据^②。选择使用乡镇层面数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乡镇作为中国基层的行政区划，可以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农村发展状况，并且，乡镇边界一般比较清晰，区域内部差异较小，采用乡镇作为地理边界的划分标准，可以保证观测样本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使用乡镇层面的数据可以剔除县（市、区）、工业区等人口产业集聚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观测更为细致的异质性效应。

^①POI 指在地理空间中具有特定功能或用途的标志性地点，每个 POI 都有明确的地理坐标（经纬度），用于标定其在地图上的位置。除了位置信息外，POI 数据还包含名称和类别（大类、中类、小类）等属性信息，被广泛应用于地图定位、位置导航、城市规划和商业选址等领域。

^②本文选择 2012 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的原因是：2012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阐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明确基本范围、标准和工作重点，引导公共资源配置。同时，受限于披露数据的滞后性，当前能获取的最新公开数据是 2021 年数据。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现有研究一般采用调查问卷或统计年鉴中的农业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等来衡量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受限于数据收集成本，农村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难以得到全面、准确度量。因此，本文采用多源地理 POI 数据^①刻画乡镇层面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在样本期内每年 POI 数量 6000 万~9000 万个不等。虽然学术界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给出了详细的定义和分类，但是受限于地理数据提供的有限信息，仅通过名称或分类判断建筑或设施的性质，无法得到其所有权或出资信息。因此，本文使用能够在乡村地理边界内以实物形态呈现的建筑或设施来度量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与生活服务这三大类构成^②。本文参照《“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取 POI 小类中属于公共产品供给建筑或设施的名称，按照公共产品供给分类标准（见表 1）统计各类 POI 数量。

表 1 公共产品供给分类标准

类别	建筑或设施的名称
基本公共服务	路牌信息、公共厕所、科技馆、道路附属设施、公园广场、科教文化场所、急救中心、邮局、公共设施、警示信息、图书馆、紧急避难场所、文化宫、交通地名、外国机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工商税务机构、政府机关、公检法机构、学校、交通车辆管理、科研机构、档案馆、疾病预防机构、综合医院
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	收费站、索道站、报刊亭、天文馆、美术馆、港口码头、博物馆、运动场所、丧葬设施、充电站、影剧院、诊所、动物医疗场所、服务区、专科医院、公交车站、轮渡站、轻轨站、公用电话、停车场、地铁站
生活服务	文艺团体、培训机构、婴儿服务场所、银行、汽车救援、综合市场、人才市场、超级市场、医疗保健服务场所、便民商店、便利店、信息咨询中心、俱乐部、体育休闲服务场所、会展中心、展览馆、运动场馆、医药保健销售店、班车站、共享设备、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

具体而言：首先，使用 Python 中的 Geopandas 库读取 POI 信息文件，并对数据进行初步检查，确保数据结构清晰且坐标系一致。其次，根据 POI 数据中每个点的分类信息，结合公共产品分类标准，判断该 POI 是否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对符合公共产品定义的 POI 进行保留，不符合的 POI 则予以剔除。再次，在数据清洗完成后，本文基于 POI 的经纬度信息，将每个点投射到中国镇级矢量地图中，使用空间映射技术识别每个经纬度坐标所对应的具体乡镇。同时，为了更好地刻画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情况，本文剔除了县域中的街道、中心镇、城关镇等区域，因为这些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水平通常较高，可能

^①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地理数据平台网站，<https://geodata.pku.edu.cn>。

^②《“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从服务供给的权责分类划分了公共服务类型，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也可以引导社会主体的补充供给。在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通过支持社会主体，实现大多数公民以可承受价格付费享有服务。此外，为满足公民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服务需求，一些完全由市场供给、居民付费享有的生活服务，可以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公共服务体系范围、水平和质量都稳步有序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与生活服务之间的分类边界也变得模糊化。

对结果产生干扰。最后，本文按照年份—乡镇维度对处理后的 POI 数据进行分组汇总，计算每个乡镇不同年份的公共产品供给状况。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乡村创业活动。借鉴已有研究（Ordeñana et al., 2024），采用当地的企业注册数量作为乡村创业的衡量方式。本文采用 Python 的 Pandas 数据处理工具按照地级市加载了 2.48 亿条工商注册数据^①。具体而言：首先，剔除企业名称、注册时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和行业分类等缺失的数据。其次，由于工商注册数据中的企业经纬度地理位置信息缺失严重，本文只能采用“正则表达式”匹配工具从企业的注册地址中抽取企业所在的乡镇位置，之后根据乡镇和注册年份汇总当地新注册企业数来衡量乡村创业活动。最后，本文将处理好的企业数量数据与公共产品数据按照年份—乡镇字段合并到同一数据集。

乡村创业活动的企业注册位置并不局限于村庄的地理边界，企业可能会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注册。这种集聚现象可能导致注册企业的地理分布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创业活动的发生地，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减少这种偏差，本文选择将新注册企业的数量按乡镇进行汇总。此外，为了得到更为清晰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提高乡村创业活动衡量指标的准确性，本文对数据进行筛选。在数据清洗过程中，基于企业的名称和所属行业，本文剔除了带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市场主体，例如医院、诊所、药店、学校等。

3.机制变量。①注意力分配。参照李燕凌和苏健（2024）的做法，本文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与乡村相关的词频作为政府注意力分配的代理变量。②替代水平。本文采用注册公司经营范围内出现的“公共”“社会服务”等关键词数量在镇级层面的汇总值作为替代水平的代理变量。关键词数量越多，替代效应越强。③信任水平。为了衡量信任水平，参照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的研究，本文采用当地非营利组织数量作为信任水平的代理变量，具体做法为：将注册名称中含有“协会”“商会”“社区中心”等关键词的市场主体界定为非营利组织，然后汇总乡镇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数量作为社会信任的代理变量。当地乡镇的非营利组织越多，社会信任越强。

4.控制变量。本文结合镇级矢量地图，采用 NPP-VIIRS 夜间灯光数据^②的平均亮度来刻画经济发展水平；采用 LandScan 全球人口分布栅格数据^③的镇级加总来表示人口数量；采用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占乡镇面积的比重刻画当地的农业特征，数据来自国家生态数据中心资源共享服务平台^④；地理特征也会影响经济行为，本文通过 ArcGIS 测度每个乡镇的平均高程、崎岖指数、乡镇中心到县级行政中心的直线距离以及乡镇面积作为地理特征变量。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①资料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②资料来源：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地球观测组，https://eogdata.mines.edu/nighttime_light/annual/v20/。

^③资料来源：LandScan 全球人口分布栅格数据网站，landscan.ornl.gov。

^④资料来源：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网站，www.nesdc.org.cn。

表2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基层公共产品供给	乡镇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 POI 数量（个）	224740	101.40	236.95
乡村创业活动	乡镇当年新注册企业数量（家）	224740	1941.35	12982.52
注意力分配	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乡村相关的词频（次）	162764	64.49	19.47
替代水平	乡镇新注册公司经营范围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词频（次）	218460	1.86	23.36
信任水平	非营利组织数量的镇级汇总值（家）	219962	76.45	26.57
经济发展水平	乡镇夜间灯光平均亮度（流明）	220446	0.73	2.97
人口数量	LandScan 全球人口分布栅格数据的镇级汇总值（人）	220446	32168	32188
水稻面积占比	乡镇水稻种植面积占比	220446	0.08	0.14
小麦面积占比	乡镇小麦种植面积占比	220446	0.08	0.20
玉米面积占比	乡镇玉米种植面积占比	220446	0.09	0.17
平均高程	乡镇平均海拔（米）	23773	683.19	918.24
崎岖指数	乡镇中心像素与其周围单元像素高程之间的平均差（米）	23773	12.97	6.95
到县级行政中心的距离	乡镇中心到县级行政中心的直线距离（千米）	23773	20.54	14.24
乡镇面积	乡镇行政区划的面积（平方千米）	23773	224.89	959.86

注：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乡村创业活动等变量在回归时取对数。

（三）模型设定

为了估计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方程具体设定如下：

$$Public_{it} = \beta_0 + \beta_1 Rural_{it} + \sum \beta_j Control_{it} + \mu_i + v_{pt} + \varepsilon_{it} \quad (1)$$

（1）式中：下标 i 、 p 和 t 分别表示乡镇、省份和年份； $Public_{it}$ 表示 i 乡镇在年份 t 的基层公共产品供给； $Rural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乡村创业活动； $Control_{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表示乡镇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乡镇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v_{pt} 表示年份—省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省域层面随年份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β_0 、 β_1 和 β_j 表示待估计参数。受限于乡镇尺度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 Li et al.（2016）的做法，本文将乡镇地理特征变量与不同阶数的时间趋势项（时间、时间二次项、时间三次项）交乘，以控制非时变的地理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乡村创业活动会影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从而对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影响。为检验其作用机制，本文在（1）式基础上增加如下回归方程：

$$M_{it} = \alpha_0 + \alpha_1 Rural_{it} + \sum \alpha_j Control_{it} + \mu_i + v_{pt} + \varepsilon_{it} \quad (2)$$

（2）式中： M_{it} 表示待检验的机制变量，包括注意力分配、替代水平、信任水平，分别可能通过倒逼机制、替代机制和信任机制三个渠道影响被解释变量； α_0 、 α_1 和 α_j 表示待估计参数；其他符

号含义与（1）式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特征事实

图1展示了2012—2021年乡村创业活动与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乡村创业活动与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变化趋势是上升的。二者的因果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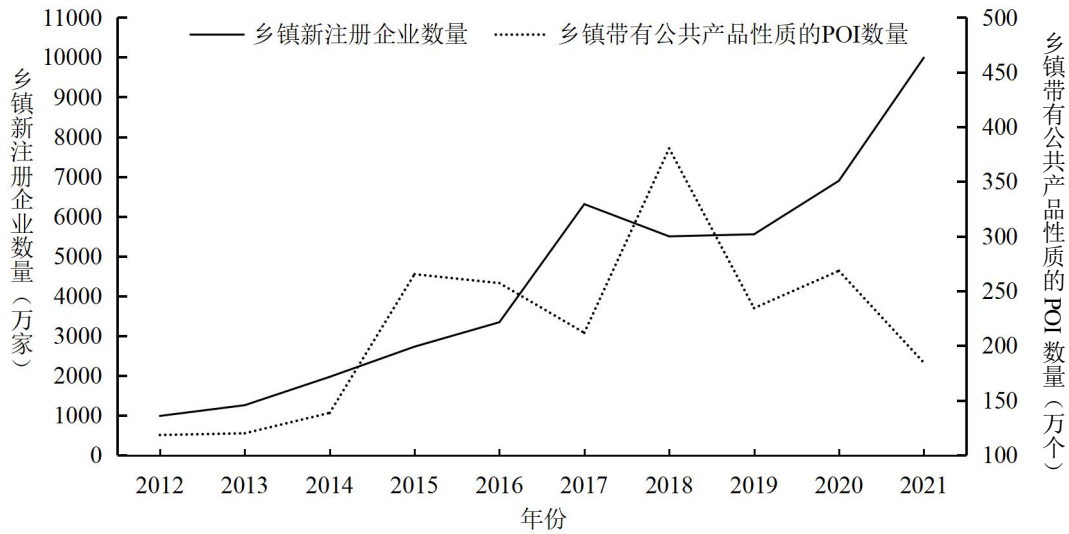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乡镇创业活动与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变化趋势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3 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基层公共产品供给							
	(1)		(2)		(3)		(4)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系数	t值
乡村创业活动	0.373***	292.799	0.185***	148.971	0.014***	3.536	0.013***	3.721
经济发展水平			-0.631***	-40.670	-0.033	-1.052	0.015	0.592
人口数量			-0.220***	-14.549	-0.041	-1.152	0.008	0.236
水稻面积占比			-0.150***	-11.634	0.007	0.167	-0.067*	-1.947
小麦面积占比			0.048***	66.265	0.003	0.659	0.000	0.021
玉米面积占比			0.000***	187.413	0.000*	1.708	-0.000***	-2.831
平均高程×时间一次项			0.000***	11.484	-0.000	-1.161	-0.002***	-3.894
崎岖指数×时间一次项			-0.042***	-44.531	-0.027	-0.681	-0.084*	-1.876
到县级行政中心的距离×时间一次项			0.000***	8.341	-0.002***	-4.205	-0.001***	-4.012

表 3（续）

乡镇面积×时间一次项			-0.018***	-34.597	0.127***	7.404	0.165***	9.800
平均高程×时间二次项			-0.000***	-10.560	0.000	1.285	0.000***	3.959
崎岖指数×时间二次项			0.003***	42.722	0.001	0.528	0.003*	1.797
到县级行政中心的距离× 时间二次项			-0.000***	-6.742	0.000***	4.157	0.000***	4.033
乡镇面积×时间二次项			0.001***	31.175	-0.005***	-7.586	-0.007***	-10.022
平均高程×时间三次项			0.000***	9.028	-0.000	-1.439	-0.000***	-4.028
崎岖指数×时间三次项			-0.000***	-41.206	-0.000	-0.394	-0.000*	-1.749
到县级行政中心的距离× 时间三次项			0.000***	5.535	-0.000***	-4.122	-0.000***	-4.064
乡镇面积×时间三次项			-0.000***	-28.916	0.000***	7.744	0.000***	10.239
常数项	2.029***	325.925	2.994***	310.674	-8.211**	-2.162	-1.362	-0.344
乡镇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年份一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24740		220446		219962		219962	
调整的R ²	0.276		0.514		0.861		0.877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乡村创业活动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表 3（1）列是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回归结果，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乡村创业活动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方向为正；为了缓解遗漏变量问题，表 3（2）列加入了控制变量；表 3（3）列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乡镇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表 3（4）列在（3）列的基础上控制了更为细致的年份一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因素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表 3（1）～（4）列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乡村创业活动变量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H1 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述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众多，难以控制所有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另一方面，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可能也会影响乡村创业活动，对因果效应的识别造成干扰，进而产生内生性问题。

1.工具变量法。历史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Nunn and Qian, 2014）。参照金环和蒋鹏程（2024）的做法，本文选择各乡镇在公元 1500 年左右的农田潜在生产力作为工具变量。农田潜在生产力数据综合考虑了光、温、水、CO₂ 浓度、病虫害、农业气候限制、土壤、地形等多方面因素。本文采用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共同开发的全球农业生态区模型，估算获取中国耕地历史生产潜力。这一变量同时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与“相关性”要求。一方面，农田潜在生产力会影响当地农民的创业决策，在耕地生产力较高的地区会有较多农民选

择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不是商业活动；同时，历史上农田产量高的地区繁荣程度也高，更容易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形成追求安稳、不愿冒险的心态，也不利于创业活动发生。另一方面，农田历史生产潜力数据是典型的历史地理特征数据，很难直接影响到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符合“外生性”要求。表4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回归结果。表4（1）列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农田潜在生产力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人均粮食产量越高的地区，乡村创业活动会越少，符合理论预期。表4（2）列中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乡村创业活动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乡村创业活动仍能显著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

表4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乡村创业活动	基层公共产品供给
	系数	系数
	t值	t值
农田潜在生产力	−0.004***	
乡村创业活动	−5.415	0.23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乡镇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一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14717	214717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146.77	

注：***和*分别表示1%和10%的显著性水平。

2. 双重差分法。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分三批组织了341个返乡创业试点县（市、区）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①，更广泛地激发了乡村地区的创业激情，营造了良好的创业氛围。黄祖辉等（2022）的研究发现，该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激发乡村创业热情、繁荣乡村产业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参照相关研究（黄祖辉等，2022），本文将返乡创业试点作为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外生政策冲击，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识别返乡创业政策实施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因果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Public_{it} = \gamma_0 + \gamma_1 Policy_{it} \times D_{it} + \sum \gamma_j Control_{it} + l_i + h_{pt} + \xi_{it} \quad (3)$$

（3）式中： $Policy_{it}$ 表示返乡创业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政策推行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D_{it} 表示返乡创业政策试点地区虚拟变量，试点地区取值为1，否则为0； l_i 表示乡镇固定效应，控制乡镇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h_{pt} 表示年份—省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省域层面随年份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ξ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γ_0 、 γ_1 和 γ_j 表示待估计参数；

^①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推广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经验的通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20/content_5638482.htm。

其他符号含义(1)式相同。

使用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此,本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并且绘制了平行趋势检验图^①。结果显示,在返乡创业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均不存在显著的政策效应。即在政策实施前,返乡创业试点镇与非返乡创业试点镇对基层公共产品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在政策实施之后,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呈上升趋势且为正。表5展示了使用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交乘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综上所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假说H1得以验证。

表5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基层公共产品供给			
	(1)	(2)	(3)	(4)
政策实施时间×政策试点地区	0.152*** (14.979)	0.082*** (3.114)	0.131*** (5.474)	0.123*** (6.437)
常数项	3.850*** (1493.507)	3.914*** (80.884)	-7.171** (-2.238)	0.112 (0.03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乡镇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年份一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210257	206808	206283	206283
调整的R ²	0.001	0.470	0.879	0.895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t值。

(四) 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度量方式。改变变量度量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考虑采用新注册企业数量作为乡村创业活动的衡量方式可能存在估计偏差,本文又选择企业净留存量(新注册企业数减去注销企业数)的累加值作为乡村创业活动的衡量指标。具体而言,本文测算观测年份前4年、6年、8年的企业净留存量的累加值。结果表明^②,控制乡镇和省份一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前文估计得到的乡村创业活动影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2.增加控制变量。为减少由遗漏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本文还加入了额外的控制变量:一是加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衡量;二是加入地区消费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采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取对数)衡量;三是加入地区人力资本作为控制变量,采用乡村从业人员(取对数)衡量;四是加入地区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采用小学在校人数和中学在

^①具体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图1。

^②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1。

校人数（取对数）衡量。结果显示^①，在依次加入上述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依旧显著，说明前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3.使用滞后一期数据。乡村创业活动的传导机制可能存在滞后性，效应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本文使用滞后一期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②，核心解释变量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在考虑滞后效应后，结果依旧具有稳健性。

4.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释。为了准确识别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需要尽可能地排除替代解释的干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商业活动的繁荣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农村地区发展，进而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为排除城市商业活动的干扰，本文采用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回归时取对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回归。结果表明^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增长并没有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这说明城市商业活动并不能推动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排除了城市商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5.缩尾处理。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改变了回归的观测值数，将 5% 缩尾、5% 截尾、10% 缩尾和 10% 截尾后的观测值使用（1）式进行回归，还进一步将数据调整为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④，核心解释变量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样本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不大，前文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机制检验

1.对注意力分配的作用机制。表 6（1）列和（2）列展示了对倒逼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1）列为统一样本量后乡村创业活动影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回归结果，（2）列为乡村创业活动影响政府注意力分配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乡村创业活动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乡村创业活动显著提升了政府的注意力分配。这意味着，乡村创业活动能够产生倒逼效应，吸引政府注意力分配，从而提升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2.对替代水平的作用机制。表 6（3）列和（4）列展示了对替代机制的检验结果。表 6（4）列结果表明，乡村创业活动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由此可证，乡村创业活动能够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产生替代效应，从而促进基层公共产品的有效增长。

3.对信任水平的作用机制。表 6（5）列和（6）列展示了对信任机制的检验结果。表 6（6）列结果表明，乡村创业活动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乡村创业活动能够通过提供公共空间加强基层的社会信任，从而提升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

^①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2。

^②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3。

^③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4。

^④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5。

表 6 乡村创业活动影响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检验

变量	(1) 基层公共 产品供给	(2) 注意力分配	(3) 基层公共 产品供给	(4) 替代水平	(5) 基层公共 产品供给	(6) 信任水平
乡村创业活动	0.012*** (3.118)	0.242** (2.426)	0.013*** (3.602)	1.487*** (2.815)	0.013*** (3.721)	0.022** (2.212)
常数项	-7.921* (-1.795)	-379.508*** (-2.582)	-1.831 (-0.465)	78.737 (1.108)	-1.362 (-0.344)	11.901** (2.34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乡镇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一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162764	162764	218460	218460	219962	219962
调整的R ²	0.879	0.765	0.877	0.552	0.877	0.858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 t 值。

五、进一步分析

（一）乡村创业规模的影响

乡村创业活动是一种建立在经济理性之上的社会性活动。也就是说，乡村创业活动的规模越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就会越为显著。从政府层面来看，乡村创业活动的规模越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会越明显，当地也更能得到政府的注意力分配；从市场层面来看，乡村创业活动能够带来规模效应，推动行业效率的提升，同时，乡村创业活动的规模越大，经营范围就越有可能会覆盖到公共产品的服务范围；从社会层面来看，乡村创业活动的规模越大，越能吸引周围的人口集聚，从而增加当地的社会信任。综上所述，当地的乡村创业规模会调节乡村创业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创业规模在二者的关系中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乡村创业规模越大，乡村创业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就越强。

基于此，本文统计当地乡镇注册资本金额 10 万元以上的注册企业数量（回归时取对数），作为乡村创业规模的衡量方式，将乡村创业规模及其与乡村创业活动的交乘项加入（1）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①，乡村创业规模与乡村创业活动的交乘项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在当地创业规模更大的地区，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促进作用会更显著。

（二）社会资本的影响

基层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降低达成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可能会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进而对集体利益产生损害。因而，集体行动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会信任、共同规范和价值观念在降低集体交易成本与合作协调集体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到农村而言，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①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6。

要组成部分，是基层社群最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宗族内的群体通过共享互惠的价值规范来积累社会资本。这种基于宗族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Ostrom and Ahn, 2003）。同时，依靠宗族力量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降低基层公共服务所需的代理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和执行成本。综上所述，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乡村创业活动越能促进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

为了检验这一预期，本文统计了当地乡镇的宗祠数量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将社会资本及其与乡村创业活动的交乘项加入（1）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①，社会资本与乡村创业活动的交乘项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社会资本强化了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调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基层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地图 POI 数据，结合工商注册数据等其他经济地理数据库，得到 2012—2021 年镇级层面 24454 个乡镇 220446 条数据，从社会功能视角考察了乡村创业活动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和机制。研究发现，乡村创业活动显著促进了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增长，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乡村创业活动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影响政府、市场和社会得以实现。从政府层面来看，乡村创业活动通过增加政府注意力提升公共产品供给；从市场层面来看，乡村创业活动通过替代部分公共产品促进了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从社会层面来看，乡村创业活动通过提升社会信任增加了基层公共产品供给。这表明，乡村创业活动的社会功能是在其经济功能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创业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地区，乡村创业活动对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越大。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乡村创业活动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有助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能忽视乡村情境中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关键是要提升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在本文的研究中，乡村创业活动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功能得到了证实，在乡村创业活动规模较大的地区，乡村创业活动的社会功能尤为明显。这一结论为以工促农、以企帮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农村占主体的乡镇地区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乡村创业活动，壮大强农惠农富民产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挥乡村创业的社会功能，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乡村创业活动促进基层公共产品供给需要多中心、多主体的参与，因此，发挥乡村创业的社会功能要求各方共同努力、高效协作，形成合力。首先，政府在基层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起到主导和调控作用，要合理分配注意力，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关注度，优先扶持公共产品稀缺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时，政府要在财政资金上加大对基层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也可以成立专项基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市场在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中通过替代机制发挥作用，可

^①具体估计结果见《中国农村经济》网站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 6。

以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有经营收益的公共产品供给中，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对于不具有经营收益的纯公共产品，可在农村地区倡导和培育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乡村创业活动（如社会创业、绿色创业、草根创业），让企业填补部分公共产品供给的空缺。最后，乡村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乡村参与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受到当地信任的影响，因此，一方面，要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引导村民根据受益程度自主分摊公共产品成本；另一方面，也要注重乡村文化氛围的营造，形成互信互助的村庄文化，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鼓励有条件的村庄通过捐赠、筹资等自愿方式自主提供公共产品。

第三，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正式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传统的资源配置机制正逐步被市场和政府机制所取代。然而，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些依靠血缘关系、宗族纽带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并未完全消解或被替代，而是融入新生机制中，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仍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发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优势，借助社会资本组织当地资源，提升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针对社会资本较为丰富的地区，政府应有意识地利用其协调整合的功能，推动宗族力量配合乡村创业活动，促进社会资本参与基层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好地服务农村地区的公共需求。在社会资本较为薄弱的地区，政府需要强化利益协调机制，通过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法治化建设，有效减少利益冲突，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傅勇、张晏，2007：《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第3期，第4-12页。
- 2.龚强、张一林、雷丽衡，2019：《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不完全合约视角下的公共品负担理论》，《经济研究》第4期，第133-148页。
- 3.郭云南、王春飞，2022：《姓氏与合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公共品供给》，《世界经济》第8期，第180-204页。
- 4.贺雪峰，2009：《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5页、第297页。
- 5.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胡伟斌，2022：《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第24-43页。
- 6.金环、蒋鹏程，2024：《企业家精神的数字创新激励效应——基于数字专利视角》，《经济管理》第3期，第22-39页。
- 7.李燕凌，2016：《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选择与绩效提升——基于5省93个样本村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11期，第81-95页。
- 8.李燕凌、苏健，2024：《地方政府建设数字乡村的注意力分配差异与政策逻辑——基于435份地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第127-145页。

- 9.刘树鑫, 2021: 《地方财政自给与民生性支出偏向: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 第110-117页。
- 10.刘志阳、李斌、陈和午, 2018: 《企业家精神视角下的社会创业研究》, 《管理世界》第11期, 第171-173页。
- 11.龙登高、王明、陈月圆, 2022: 《传统士绅与基层公共品供给机制》, 《经济学报》第2期, 第344-362页。
- 12.龙登高、王正华、伊巍, 2018: 《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基于清代公共建设与管理的研究》, 《经济研究》第10期, 第175-191页。
- 13.罗家德、李智超, 2012: 《乡村社区自组织治理的信任机制初探——以一个村民经济合作组织为例》, 《管理世界》第10期, 第83-93页。
- 14.乔翠霞、王骥, 202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公共品供给的路径创新——大宁县“购买式改革”典型案例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第22-34页。
- 15.曲延春, 2015: 《差序格局、碎片化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整体性治理》, 《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第70-73页。
- 16.苏毅清、覃思杰、舒全峰, 2024: 《制度路径融合激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机制——基于嵌套制度体系分析框架》,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161-184页。
- 17.孙谋轩、朱方伟, 2023: 《公私制度逻辑冲突与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的合作行为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第3期, 第233-243页。
- 18.王丹利、陆铭, 2020: 《农村公共品提供: 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 《经济研究》第9期, 第155-173页。
- 19.邢小强、仝允桓、陈晓鹏, 2011: 《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商业模式: 一个多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第10期, 第108-124页。
- 20.颜色、刘丛, 2024: 《18世纪中国的粮价、社会冲突与公共品供给: 地区异质性与政府-社会的互补作用》, 《经济学(季刊)》第1期, 第205-219页。
- 21.张维迎、柯荣住, 2002: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 《经济研究》第10期, 第59-70页。
- 22.Alsos, G. A., S. Carter, and E. Ljunggren, 2014, “Kinship and Business: How Entrepreneurial Households Facilitate Business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6(1): 97-122.
- 23.Baktir, Z., and F. Watson, 2021, “Trust-Driven Entrepreneurship for Community Well-Being of Refugees and Their Local Hosts”,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41(2): 251-266.
- 24.Barkema, H. G., U. K. Bindl, and L. Tanveer, 2024, “How Entrepreneurs Achieve Purpose Beyond Profit: The Case of Women Entrepreneurs in Nigeria”, *Organization Science*, 35(3): 1042-1071.
- 25.Brass, J. N., 2012, “Blurring Boundaries: The Integration of NGOs into Governance in Kenya”, *Governance*, 25(2): 209-235.
- 26.Buchanan, J. M., 1965,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ica*, 32(125): 1-14.
- 27.Da Fonseca, A. L. A., and R. D. Campos, 2021, “The Cultural Intertwining of Consump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 Selective Review of Qualitative Stud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135: 149-162.

- 28.Demsetz, H., 1970, "The Privat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3(1): 293-306.
- 29.Emerson, K., N. Tina, and B. Stephen, 2012,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2(1): 1-29.
- 30.Jones, C., S. H. William, and P. B. Stephen, 1997, "A General 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 Exchange Conditions and Social Mechanism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2(4): 911-945.
- 31.Koch, I., 2005, "Sequential Task Predictability in Task Switching",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2(1): 107-112.
- 32.Li, P., Y. Lu, and J. Wang, 2016,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123: 18-37.
- 33.Musgrave, R. A., 1959, "Taxes and the Budget", *Challenge*, 8(2): 18-22.
- 34.Nunn, N., and N. Qian, 2014,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6): 1630-1666.
- 35.Ordeñana, X., P. Vera-Gilces, J. Zambrano-Vera, and A. Jiménez, 2024, "The Effect of High-Growth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171, 114243.
- 36.Ostrom, E., 1998,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1): 1-22.
- 37.Ostrom, E., and T. K. Ahn, 2003,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65(1): 155-233.
- 38.Samuelson, P. A., 1954,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7(4): 387-389.
- 39.Samuelson, P. A., 1955, "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7(4): 350-356.
- 40.Santos, F. M., 2012, "A Positive Theor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1(3): 335-351.
- 41.Shigetomi, S., 2006, "Bringing Non-Governmental Actors into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Case of Local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ailand", IDE Discussion Papers, Vol. 69, <http://hdl.handle.net/2344/149>.
- 42.Small, M. L., and L. Adler, 2019, "The Role of Space in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1): 111-132.
- 43.Torres-Montoya, M., 2008, "Innovative Urban Transport Cooperation by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Indi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2063(1): 10-17.
- 44.Tresch, R. W., and A. Zlate, 2007, "Explorations into the Production of State Government Services: Education, Welfare and Hospitals",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Vol. 432, <http://fmwww.bc.edu/EC-P/wp679.pdf>.
- 45.Tsai, L. L.,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2): 355-372.
- 46.Weiss, T., M. Lounsbury, and G. Bruton, 2024, "Survivalist Organizing in Urban Poverty Contexts", *Organization Science*, 35(5): 1608-1640.

Benefiting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Mechanism by Which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Improve the Provision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LIU Zhiyang LI Tianxu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umma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n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and analyzes how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actors collaboratively dr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ycentric governance. With the deepe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obilizing social acto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not only yield economic benefits but also bring considerable social benefits, especially in promoting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with a unique driving effect.

Based on town-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2 to 2021, this study uses multi-source geographic POI data and business registration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driving effect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growth on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Applying econometric methods such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longside techniques for eliminating outliers and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 interference,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growth of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supply by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ccurs primarily through three channels: the government-level forcing mechanism, the market-level substitution mechanism, and the social-level trust mechanism. Specifically, when facing changes in social demand driven by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 adopts more proactive policies and investments, creating a forcing mechanism; the spontaneous adjustment of the market encourages more flexible responses to public goods supply through the substitution mechanism; while the social-level trust mechanism fosters the creation of public spaces for villager participati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In conclusion, rur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not only provide an economic boost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supply of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Through efficient collaboration and concerted efforts amo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actors, the social utility of rural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fully leveraged, enhancing the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Rural Entrepreneurship; Grassroots Public Goods; Multi-Centered Governance; Township-Level Panel Data

JEL Classification: H41; H54; D62

(责任编辑：柳 荻)